

据 1959 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版

过去的工作

周作人
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

写闲适文章，确是吃茶喝酒似的。

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。

好些年前我作了一篇小文，

我心中有两个鬼。

一个是流氓鬼，一个是绅士鬼。

如果说得好一点，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。

但也不必那么说，所以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。

过去的工作

周作人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去的工作 / 周作人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6

ISBN 978-7-5426-6586-7

I. ①过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9649号

过去的工作

著 者 / 周作人

责任编辑 /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李书雅

装帧设计 / 微言视觉 |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朱 鑫 柏蓓蕾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40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9年6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76千字

图 片 / 13幅

印 张 / 4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586-7 / I · 1486

定 价 / 36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出版说明

1959年11月，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周作人《过去的工作》，署名“知堂”。《过去的工作》原与《知堂乙酉文编》合编为“乙酉文编”，于出版时析为二册。《过去的工作》中收录周作人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所作杂文十五篇——读书、评论、写景、状物、怀人，既有“正经”的讨论，亦有“闲适”文章。究竟哪种于周氏写作上更有分量？周氏在《两个鬼的文章》中说：“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，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，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，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。”

1985年，上海书店印行《过去的工作》，收入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丛书，该版简介中认为，集中三篇书信抄——《饼斋的尺牘》《实庵的尺牘》《曲庵的尺牘》有史料价值。

2002年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据新地出版社1959年初版整理出版《过去的工作》。

2013年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。

周作人作品版本众多，各有优长。本版《过去的工作》为求更切近作者之旨意，以“周作人自编文集原本选印”为原则，篇目依周作人“自编”目录整理编排，以新地出版社 1959 年初版为底本，同时以流行版本互为印证，以求“正本溯源”。

同时，本版依据内文中提及的原则插图，主要为周作人文中提及的人、事、物、关联场景等，共计 13 幅，其中有民国时期老照片，如西德尼·甘博所摄之民国时期雍和宫“打鬼”照片、西泠桥照片，约翰·汤姆森所摄之南方街景。更包含周作人《东昌坊故事》《凡人的信仰》原稿手迹。

我们努力呈现最好的版本给读者诸君，唯能力时间有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也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。

周作人作品出版编辑部

2019 年 3 月

目 录

001	/ 关于竹枝词
007	/ 谈胡俗
017	/ 关于红姑娘
025	/ 石板路
033	/ 再谈禽言
042	/ 关于遗令
050	/ 《读书疑》
059	/ 东昌坊故事
066	/ 焦里堂的笔记
075	/ 凡人的信仰
086	/ 饼斋的尺牍

- 102 / 实庵的尺牍
- 112 / 曲庵的尺牍
- 124 / 过去的工作
- 130 / 两个鬼的文章

关于竹枝词

七八年前曾经为友人题所编《燕都风土丛书》，写过一篇小文，上半云：

不佞从小喜杂览，所喜读的品类本杂，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，古迹名胜固复不恶，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。中国地大物博，书籍浩如烟海，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，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，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。不佞生于会稽，曾寓居杭州南京，今住北平，已有二十余年，则最久矣。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，得读《砚云甲编》中之

* 1945年7月20日作。

《陶庵梦忆》，心甚喜之，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，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。尔后见嘯园刊本《清嘉录》，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，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，《藤阴杂记》《天咫偶闻》及《燕京岁时记》，皆言北京事者，常在案头，若《帝京景物略》则文章尤佳妙，惟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，辜负余六年浪迹白门，无物作纪念也。

去年冬天写《十堂笔谈》，其九是谈风土志的，其中有云：

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，性质很是特别，本是史的资料，却很多文艺的兴味，虽是小品居多，一直为文人所爱读，流传比较的广。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，物产风俗，其事既多新奇可喜，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，自然更引人入胜，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，内容固易于有统一，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，这是读大部分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。这些地理杂记，我觉得他好，就是材料好，意思好，或是文章好的，大约有这几类。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，单就古代来

说，晋之《南方草木状》，唐之《北户录》与《岭表录异》，向来为艺林所珍重。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，农医二家门户各别，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，此外还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名物笺注而已。其二是关于前代的，因为在变乱之后，举目有河山之异，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，追怀昔年风景，自不禁感慨系之，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，追逐过去的梦影，鄙事俚语不忍舍弃，其人又率有豪气，大胆的抒写，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。宋之《梦华》《梦粱》二录，明之《如梦录》与《梦忆》，都是此例。其三是讲本地的，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，不过有这一点差别，前者所记多系异地，后者则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，重在怀旧而非知新，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，燕云十六州的往事，若能存有纪录，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，可惜未有什么留遗，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。明末的《帝京景物略》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，即使后来有《日下旧闻》等，博雅精密可以超过，却总是参考的类书，没有《景物略》的那种文艺价值。清末的书有《天咫偶闻》与《燕京岁时记》，也都是好的，民国以

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《旧京琐记》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。

上边两节虽然是偶尔写成，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得颇为明白，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文，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，反正道理也是一样。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，这是些什么呢？《两都》《二京》，以至《会稽三赋》，也都是的，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类大著，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。说起竹枝的历史，大家都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，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，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《列女传》，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《山海经图赞》，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，而名为竹枝者，以刘禹锡作为最早，这也是事实。案《刘梦得文集》卷九，竹枝词九首又二首，收在乐府类内，观小引所言，盖本是拟作俗歌，取其含思宛转，有淇濮之艳，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诗化吧。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，歌咏风俗人情，稍涉俳调者，乃是竹枝正宗，但是后来引申，咏史事，咏名胜，咏方物，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，而且篇章加多，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，虽然风趣较前稍差，可是种类繁富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。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，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《郴江百咏》，著者阮阅，即是编《诗话总龟》的人，此书作于宋宣和中，已在今八百年前矣。

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，惟清初朱竹垞的《鸳鸯湖棹歌》出，乃更有名，竹枝词之盛行于世，实始于此。竹垞作《棹歌》在康熙甲寅，谭舟石和之，至乾隆甲午，陆和仲张芑堂又各和作百首，蔚成巨册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，可谓盛事。此后作者甚多，纪晓岚的《乌鲁木齐杂诗》与蔡铁耕的《吴歆百绝》，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。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，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，后来注渐增多，不但说明本事，为读诗所必需，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，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，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。厉惕斋著《真州竹枝词》四百首，前有小引一卷，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，有一万二千馀言，又黄公度著《日本杂事诗》，王锡祺抄录其注为《日本杂事》一卷，刊入《小方壶斋丛抄》中，即是一例。这一类的诗集，名称或为百咏，或为杂咏，体裁多是七言绝句，抑或有用五言绝句，或五言七言律诗者，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，风俗方物，或年中行事，抑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，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，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，其以诗为乘，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，则固无不同。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，虽然如竹垞《棹歌》第十九首云：

姑恶飞鸣逐晓烟，红蚕四月已三眠。

白花满把蒸成露，紫椹盈筐不取钱。

这样的诗我也喜欢，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“土风”，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，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。我在《十堂笔谈》中又说：

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，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，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，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，我们无须去劝驾，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，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，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，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，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，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，此虽是寂寞的学问，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。

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，暂且从缓，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，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，所记是风土，而又是诗，或者以此二重原因，可以多得读者，但此亦未可必，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。

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，北京

谈胡俗

萧伯玉《春浮园偶录》，在崇祯三年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条下有一则云：

读范石湖《吴船》《骖鸾》诸录，虽不能如放翁《入蜀记》之妙，然真率之意犹存，故自可读。惟近来诸游记正苏公所谓杜默之歌，如山东学究饮村酒、食瘴死牛肉，醉饱后所发也。

《入蜀记》多记杂事，有《老学庵笔记》的风格，故读之多兴趣，如卷四记过黄州时事，八月二十一日条下云：

* 1949年2月10日刊《好文章》。

过双柳夹。回望江上远山重复深秀，自离黄虽行夹中，亦皆旷远。地形渐高，多种菽粟荞麦之属。晚泊杨罗汛。大堤高柳，居民稠众，鱼贱如土，百钱可饱二十口，又皆巨鱼，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。

又卷一之金山寺榜示，赛祭猪头例归本庙。卷五之王百一以一招头得丧，遂发狂赴水几死。诸事皆有意思，更多为人所知。石湖记行诸录自较谨严，故风趣或亦较少，惟在三录中我读《揽辔录》却更有所感，这是乾道六年八月使金的记事。元本二卷，今只存寥寥数页，盖是节本，不及楼攻媿的《北行日录》之详，但因此得见那时北地的情形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八月丁卯即二十日至旧东京，记其情状云：

新城内大抵皆墟，至有犁为田处，旧城内粗布肆，皆苟活而已。四望时见楼阁峥嵘，皆旧宫观寺宇，无不颓毁。民亦久习胡俗，态度嗜好与之俱化。最甚者衣装之类，其制尽为胡矣，自过淮已北皆然，而京师尤甚。惟妇人之服不甚改，而戴冠者绝少。

案《北行日录》卷上记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入东京城，十日条下有云：

承应人各与少香茶红果子，或跪或喏，跪者胡礼，喏者犹是中原礼数，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，尤使人伤叹。

自二帝北狩至乾道初才四十年，中原陷没入金，民间服色行动渐染胡风，观二书所言可知其概。惟民情则仍未变。《北行日录》记十二月八日至雍丘即杞县，有云：

驾车人自言姓赵，云向来不许人看南使，近年方得纵观。我乡里人善，见南家有人被掳过来，都为藏了，有被军子搜得，必致破家，然所甘心也。

又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：

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，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。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，至燕山，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，三节人亦人得一裹，自赞曰：李和儿也。挥涕而去。

习俗转移，民间故亦难免，但别方面复自有其不变者在，此在放翁、石湖、攻媿诸君亦当察知，而深以引为慰者也。

两年前的秋天我写过一篇文章，题曰“汉文学的前途”，后边附记里，有这样的一节话：

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，自他均无异辞，但民族间自有维系存在，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。此在平日视之或亦甚寻常，惟乱后思之，正大可珍重。我们翻史书，见永乐定都北京，安之若故乡。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，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，东至宁古塔，西至乌鲁木齐，市街住宅种种色相，不但基本如一，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，亦多具有，常令览者不禁苦笑。反复一想，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？思想文字语言礼俗，如是而已。

当时我是这样想，中国幸亏有汉字这种通用文字，又有以汉字能写下来的这种国语，得以彼此达意，而彼此又大抵具有以儒家为主的现实思想，所以能够互相维系着，假如用了一种表音的文字，那么言语逐渐隔绝，恐怕分